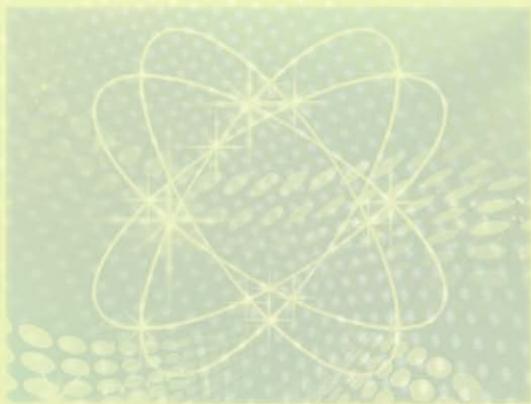


激进的儿子



致谢

自传并非是整个人生的流水账，而是感悟人生的一种努力。因此，对我而言比较亲近和重要的一些人本书并没有提及，其中一些人也许会感到自己受到忽视，我想借此机会向他们表达歉意。我同样要向下面这些人表达歉意：他们不愿被写进这本书，但因叙事的整体需要不得不在书中出现，尤其是我的家人——他们以前不得不忍受因卷入我的公众生活而产生的苦恼，而现在又变成我出版的故事里的人物。

我的家人读过本书的原稿，他们的意见，尤其是支持对我帮助甚大。其他读过整部或部分原稿并提出有益建议的人有罗恩·拉多什、索尔·斯特恩、鲍勃·卡尔登巴克、康斯坦斯·米勒和彼得·科利尔。我的女儿莎拉帮我定下了本书的基调，并纠正了书中的一些错误。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在本书所记述的生活中，我的孩子和朋友们给予了我亲情和鼓励，我对此深表感谢。我尤其要感谢埃利萨，她从来不愿成为任何公众故事的一部分，对她而言，书中的某些记述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回忆。

我还要感谢玛丽·科利尔，不仅是因为她本人的友谊，更是因为她曾经给予我与其丈夫两人友谊的支持——除我的家人外，他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至交。

另外，我要感谢亚当·贝洛邀请我写这本自传，并花费时间认真编辑我的文稿，这样的编辑现在很少见了。还要感谢我的制作编辑洛雷塔·登纳和文字编辑乔治·A·罗兰，他们竭尽所能使文稿变得更为出色。对于代理人乔治斯·博哈特在我的整个写作生涯中给予的所有帮助，我同样深表感谢。

所有那些刚刚登台亮相的年轻激进分子们，如果能够对这个故事加以深思，就会从故事所提供的教训中获益良多，可惜他们根本不会读这个故事。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关于本书平装本的几点说明：针对读者指出的精装本的打印错误和某些事实方面的小出入，平装本进行了勘正。例如，B-29 空军中队只在太平洋战场战斗过，因此我在 1944 年看到的飞机只能是 B-17 或 B-24 空军中队。不过，有一处修改需要解释一下。最近出版的一些资料，披露了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与其苏联控制者之间的密码通讯。《美国共产主义的秘密世界》一书的作者之一哈维·克莱尔教授让我注意这些新资料，我据此对书中提到的有关安·科洛姆斯的轶事进行了修改。30 年前，安·科洛姆斯向我讲述她的故事时，只是提及她“卷入了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她的讲述有些含糊其词，我在书中曾提到过，这是进步分子惯用的讲述方式。由于安·科洛姆斯已经去世 20 多年，又没有其他人可以去查证，我在原稿中只能对这件事进行推想。结果，我错误地认为安参与了实际的暗杀行动。现在，卡莱尔教授友好地指出这个错误，我也相应地进行了更正。不过，这件轶事所要阐述的要点，也就是美国共产党人曾被苏联间谍机构所利用，仍旧是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

序

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个秋天，我去了父母的墓地。是我把母亲葬在了父亲的旁边，埋在了长岛的泥土之中。她的坟墓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几乎无法将其与父亲的坟墓区分开，这对夫妻如同生前一样再次携手同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我捡起脚下小道上的鹅卵石，放在他们的墓碑之上以示悼念。母亲的墓碑之上镌刻着一首名为“永远”的歌曲，这是她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的最后几年里钟爱的一首歌。对我而言，这首歌象征着母亲曾经是家人尤其是我的坚强后盾。父亲的墓碑是我在五年前埋下的，已经开始风化。我让石匠在他的墓碑上刻下的文字是“生活就是斗争”，这是他所喜爱的、引自他的导师卡尔·马克思的一句格言。但在我们埋葬他之前很久，他就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

仅就其象征意义而言，这次还乡表明了我的回归之路是多么的漫长，距离之远堪比南北极点。当我已为人父的时候，与自己的父母却形同路人，我们的经历天差地别，我几乎不再指望他们能够为我提供任何建议。然而，有时我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并非那么疏远。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我感到他们总能够看穿我的心思，并竭力安慰我，就好像我是个玻璃人一样。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已化为泥土的今天，都能

像50年前那样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就生命本身而言，只有毫无牵挂地回归大地才能令我们获得自由。

再次感觉到了父母的存在，我试图想象出他们生前对我的印象，但无论如何努力我都无法做到。我想象不出他们如何看我，如何感受我所忍受的痛苦，或者如何理解我所经历的一些变化：中年时代经历的谋杀事件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如此深爱并费尽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家庭破裂了；我脱离了他们终生依附的所谓进步群体，朝圣般地去接受那个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并始终加以拒绝的美国。

我如何在政治上和父母成为陌路人，并在一场冷战中加入了反对其信仰的另一方？他们相信自己的信仰是人类最美好的希望。我就像他们那一代人中的惠特克·钱伯斯——那是一个曾被高尚的左派激情所鼓舞，但后来又勇于揭露激进事业阴暗面的年轻人——曾经与包括背叛、死亡甚至苏联间谍在内的极权势力发生过冲突；曾经因我的反思而被一种同情左派并对其反对者抱有敌意的文化妖魔化；也曾经遭到我的前同志们的野蛮人身攻击，他们做出这种攻击只是为了鼓舞其他人继续待在激进事业的围栏里。

与钱伯斯一样，我成为我那代人中最受人憎恨的前激进分子。与他一样，我发现曾经与之激烈斗争过的敌人变得更加虚幻而不是更加真实。我还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反思也成为其他一些人追求的自然过程，只是他们更少为公众所注意罢了。我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点特殊——甚至有时我也这样认为——却不孤立，它更像是时代中的一个片段。

由于我的经历，我常常在想，由外向里观察一个人的生活，所看到的结果与实际情况相比是多么不同。外界对我的描述很少与实际相符。不错，名字是我的名字，但他们所描述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他们把一些外在的事实加在我头上，可那根本不能说明我的为人。这个问题并非我所独有，只是由于我的生活过于曲折，常常使其他人难以追踪罢了。甚至那些为我目前

的袒露心声鼓掌喝彩的支持者，也常常因其没有我那样的经历或者不完全确定我的意图，而对我这样一个充满秘密的人心存疑虑。至于那些仍在为我变成了怎样一个人而争吵的前同志们，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对他们而言，我从来不是一个曾经感其所感，梦其所梦，经受过痛苦并从中吸取了教训的人。在他们看来，如果把我看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会造成以下难以面对的问题：他们进行过反思吗？他们不得不放弃哪些幻想？于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更为简单的道路——拒绝，斥责我是弃他们而去的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更糟糕的是，他们害怕成为像我这样的人。

现在，在意识形态的保守派这边，我就像先前在左派阵营中一样知名。以前我曾把保守派视为敌人，但在加入他们之后，我发现情况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名字本身无法表明他们或者我实际上是怎样的人，因为政治中的道德语言已被激进分子所把持。已经曝光的事实表明，所谓的进步的左派人士——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已经成为堕落天使。

在我的新战友中，许多人与我一样都曾是 60 年代激进分子，现在则开始进行反思。实际上，在过去些年里，整个国家已经从激进的 60 年代及其破坏性的轨道上回撤。我在人生旅途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所获得的教训，看来其他美国人也同样体会到了。欧文·克里斯托尔早在我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反思，他观察到，任何一代人都面对来自他们那些需要文明化的孩子们的野蛮威胁。这将是一项长期的挑战：教会我们的年轻人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在一个永远也不会完美的世界中承担起人生的责任。拒绝与不完美的现实妥协，是激进冲动的实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血事件都是由此造成的。我自己的生活常常痛苦不堪并多次脱轨，作为故事本身并不连贯，但却是我们所共有的历史背景的一部分。

目 录

=====

致谢	001
序	001
第一章 黑洞	001
菲维尔	001
俄 国	011
布兰奇	020
第二章 成长	031
向阳花园	031
偶 像	042
忠 诚	060
殉道者	076
埃利萨	090

第三章 新天地	101
伯克利	101
伦 敦	126
第四章 革命	169
权力属于人民	169
把战争转移到国内	196
几代人	225
第五章 黑豹党	245
休 伊	245
贝 蒂	268
第六章 私人调查	282
问 题	282
离 婚	316
安魂曲	348
第七章 回家	372
反 思	372
破坏性的一代	418
垮台之后	451
后记：认识之美	502
父与子	502

第一章 黑洞

(1904—1939)

你看不到吗

他在岩石里也没有家……

——黑人灵歌

菲维尔

说真的，父亲留给我的是一些故事，主要是他自己的故事，但也有一些是关于祖父的。我对祖父所知不多，他在我六岁时死于癌症。事实上，我对祖父莫里斯的唯一清晰的记忆永远让我感到自责。那是在我六岁时，他坐在我喜爱的七个小矮人玩具身上，嘴里唱着“嗨嗨嗨嗨，我们该出去工作了”，结果把它们压碎了。我冲他大叫，撕心裂肺地大喊来表示抗议，就好像我的狂吼能使玩具复原一样。这件事过后不久，家人就把祖父送进医院，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祖父已经去世近50年了，而我现在则坐在自己家里浏览从父母屋里拿来的一本相册。相册用一层绣有白玫瑰的红色天鹅绒包裹着，门锁已经坏掉了，边上也有些磨损，封面上镶嵌着一幅瓷画，其中一个场景是一对情侣手牵着手漫步在维多利亚

时代的公园里。相册里面是一些凹版照片，照片里的孩子和大人姿势僵硬，有些人有着闪族人的面部特征，有些人有着斯拉夫人的高颧骨，还有些人有着东方人的眼睛。他们衣冠楚楚，身着不同民族风格的服装：有的身穿马甲和高领上衣，看起来已经美国化了，有的则穿着俄式上衣和靴子。就面部特征而言，他们既有可能是父亲的祖先，也有可能是母亲的祖先。不过我想，他们看起来更像是母亲的祖先。

不过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相册中有些照片已经脱落，露出了白色衬底，上面有出自孩子之手的铅笔字痕迹——“菲维尔、安娜”。那是父亲和祖母的名字，好像是父亲为了练习英文拼写而留下的，说明这些照片上的人可能不是母亲的亲戚，而是父亲的。这些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在照片中并没有看到祖父莫里斯和他的妻子安娜，或者其他我认识的人。相册里的名字在我看来都如此陌生，能够记得并告诉我他们是谁的人也都不在人世了。

除了消逝之外，生活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吗？我们在生活中前后判若两人，以前的我们早在死亡之前就消失了。我们曾经有过自知之明吗？我还记得在自己还是 20 岁的年轻人时，曾经发誓绝不会变成 40 岁时这个样子。对于我生命轨迹的转变，还有什么人能比我更感到吃惊吗？我的记忆里有太多的痛苦，不过对此我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把它们看成是必要的，甚至在某些意义上是有益的。

在我的所有长辈中，母亲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人。80 岁高龄之后，她已经不能说出一两句完整的话，于是自己杜撰了一句箴言——“生活乃神秘之事”，来回答她不知道答案的那些问题。我曾经向父亲表露过这种想法，那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神秘主义这种东西。父亲那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无法接受“生活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这样的话。我的话令他像一个受到褻渎的虔诚信徒一样勃然大怒。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奉，已使他确信找到了解答生活中重要问题的那

把钥匙，他不希望儿子丢掉这把钥匙。

像父亲那样的政治乌托邦主义者有一个总体设想，他们要把这个世界从无序状态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没有痛苦、充满友爱的地方。在对生活最没有预期的时候，人们会备受折磨，肝肠寸断。在父亲他们梦想的幸福未来里，因对生活失去控制而伤心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人类的悲惨生活将成为过去，成为历史遗迹博物馆中的一段回忆。父亲心目中的天堂里不会有陌生人，任何人不会感到自己是陌生人，感到自身被异化，与本我不一致。

35年里，我一直追随父亲的脚步，对他的救世言行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有些悲剧人们永远无法避免，没有任何一种革命能够消除人们心中的异化感。我们就是那个神秘之物，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唯一真理。

祖父莫里斯骨瘦如柴，不到五英尺高，有着一双阴郁的眼睛，一头蓬乱的白发毫无生气地倒向一边。他的真实名字叫摩西。与他的那位同名者一样，祖父逃脱了在沙俄帝国西部边界的“栅栏区”^①服苦役的命运。在1905年的大逃亡中，他同妻子和两个幼子一起，与其他成千上万为躲避大屠杀而离开俄国的犹太人一道前往美国。就像希伯来人出埃及一样，他们横越大海，奔向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

祖父又一点也不像摩西。他没有带领任何人，相反却是被他的妻子安娜带领着前进（如果由母亲来讲述这个故事，她会

① 18世纪下半叶，由于波兰东部部分领土并入俄国，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犹太人也随之归入俄国，于是侨居俄国的犹太人激增至90万。沙俄政府对大批到来的犹太人仍然实行种种歧视和迫害政策。179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以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为名，将瓜分波兰时犹太人的定居区划为所谓的“栅栏区”。当局规定：犹太人只能在这些区域内居住和活动，不能移居到区域之外，只有个别犹太人经过特许之后才能到“栅栏区”外去工作或旅行。——译者

说是被牵着鼻子)。祖母是一个把编成辫子的浓密头发挽成圆髻的矮小女人，她与祖父的婚姻把他从沙俄帝国的征招中解救出来，是她缔造了这个家庭。在他们家里，祖母的话就是法律，正如在我们家里母亲的话就是法律一样，只不过在我们家里表现得更为隐蔽。

祖父原来在乌克兰西部的莫西尔作裁缝，后来来到美国。在埃利斯岛^①，可能是移民官员把他的姓从“古列维奇”翻译成了“霍洛维茨”。与生活中的其他时候一样，他把这种改变当做不可抗拒的命运接受下来。抵达美国后，他们在曼哈顿下东区的德兰西街定居下来。在那里，祖父被一家周薪3美元的血汗工厂雇用。与其他移民一样，他常常被要求工作到很晚，有时由于太晚了，他不得不睡在车间缝纫机下面的地板上。

祖父不仅不能勇敢地反抗他的妻子，甚至由于过于怯懦而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与摩西一样，他见到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但却无法融入其中。这片土地上的竞争和活力压迫着他，并最终将他压垮。家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祖父不是摩西（Moses），而是一只老鼠（mouse）。

在父亲讲的所有关于祖父的故事里，下面这个是关键性的内容。一天晚上，祖父下班回来得比往常要晚。妻子准备好的饭菜早已经凉了，他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地坐下吃饭。尽管祖母明白祖父回来晚了是他自己不能左右的，但她仍然怒不可遏。从旧世界的牢笼里逃出来，却又在新世界里进入了另外一个牢笼，这让她感到愤怒。祖父这只在俄国能够逃脱苦役的老鼠，却不能够在美国带领他的家人脱离贫困。

所有在其婚姻中没有表露过的激情，现在都被安娜用于表达对自己不幸生活的愤怒。在这些由一顿变凉了的晚餐触发的

^① 位于纽约。1892年，埃利斯岛移民中转站正式成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将近2200万的新移民进入美国之前停留在那里接受调查。——译者

愤怒中，困窘的处境、缺少爱情的家庭以及贫困的异国生活是祖母倾诉的主要内容。莫里斯小心翼翼、沉默不语地继续吃着他的晚餐。妻子的抱怨如洪水般决堤而出，于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男人，曾经一贯平静地忍受妻子的愤怒和冷漠，就像忍受其他生活中的不幸对他的伤害一样，这次却突然发怒了。他把餐叉猛地戳到面前的盘子上，力量大得把盘子都戳碎了。半个世纪后，父亲在向我讲起这个故事时，对祖父的这次发怒仍然心有余悸。这是人们所能记得的祖父对其不幸处境的唯一一次反抗。

记忆中幼时见到的那位穿着不合身的花布衣服的老妇人，与前面提到的形象是如此的不般配，我从来都无法真正将两者对上号。当时父母带我去看望祖母，涌进屋内的充满美国式活力的人，似乎让她感到陌生和局促。然而，正是她推动自己的小家庭跨越大陆和海洋，离开还处于茅草屋和马车时代的乌克兰穷乡僻壤，闯进了有着摩天大楼和汽车的现代化社会。

她的进取心是如此的强烈，从不停歇，不久就把家人从令人感到相当亲切的下东区迁移到了约克城高地。虽然犹太人在那里还比较罕见，许多人对犹太人抱有敌意，但她的孩子可能会得到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对她而言，这个世界上的可怕事情是如此的真实，于是她把孩子置于自己的严密控制之下。父亲和姊妹在铺满鹅卵石的街道上玩耍时，决不许走出祖母声音所及的范围。祖母的担心成为束缚父亲童年生活的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牢笼。

一天，父亲正与邻家男孩在街上放风筝，忽然从租住的房子那边传来祖母伤心的声音。“菲维尔，菲维尔！”她大声喊叫着。在这种声音的打击下，父亲呆立在那里。“菲维尔！”他立刻明白了这声召唤的深义。他尽可能快地收卷起风筝，带着强烈的羞耻感匆忙回家。60年后他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羞耻感仍折磨着他。让他尴尬的原因是，他拿了祖母唯一的一套内衣

裤，把它们撕开做了自己风筝的尾巴。父亲向我承认这件事时，声音变得痛苦低沉，好像有人踩在他的胸口。60年了，他仍没能从沉重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

在笼罩我们生活的浪漫的政治氛围中，父亲童年时期留下的清晰伤痕，被当成是反映社会差别的标志。受穷挨饿导致的佝偻病，使他有了一双罗圈腿。这是他最显著的身体特征。在没有其他清晰可辨的特征时，我可以据此从远处认出他来，这似乎是他之所以成为我父亲的一个标志。他有运动员的体格，骨头劳损，但小腿和大腿肌肉强健。我喜欢抚摸他结实的胳膊和匀称的双肩，不过在他偶尔抱我时，很少让我感到期望中的舒适和快乐。他的拥抱更像是一种挤压，而不是有所依靠的温暖——他仿佛害怕自己的情感，不想让其过于外露。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做长辈时的自我封闭源于他儿时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从未消失。在其家庭进入美国的行动中，他被迫“自愿”充当了这个家庭的“先遣军”，任务就是突破周围有形无形的边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人们使用的不是他的家人所讲的意第绪语，喊他时用的也是他的英文名字——菲利普。受语言和文化的限制，他的父母仿佛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他们怎能理解我的父亲所遇到的困难，所面对的危险？我逐渐明白，父亲的“自我封闭”是一种自卫的本能，与其说是怕伤到我，不如说是怕伤到他自己。自我封闭构筑了一片安全区：没有冒险，就不会有损失。

在他13岁的时候，父亲与其他一些被认为具有学术天赋的年轻人一起被送到了汤森德-哈里斯学校，那是一所教授拉丁语的三年制专门中学。那里的课业超出了父亲的能力，他感到绝望了。他的学习成绩一团糟，于是他把老师寄到家里的成绩单藏起来，以此来掩盖他那可怜的评分。绝望的时候，他甚至篡改成绩。他的父母看不懂英文，这使得此类欺骗相对容易得多。可是他无法欺骗自己。对被别人揭穿的担心，始终萦绕在父亲的心头。他总是在担心别人发现他不能适应这个地方，

其实，他不能适应任何地方。

我的母亲是一个长着一头乌发的端庄女人，噘起的嘴唇看起来像是在拒绝什么，正是她把我宠坏了。父亲经常会限制我，而母亲则会私下劝说他取消这些限制，有时会背着他满足我的一些愿望。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八岁生日那天，打开房门，看见父亲怀里抱着一辆红蓝相间的自行车站在门口。我兴奋异常，因为往常父亲连那种廉价的棋盘类游戏都不肯买给我，照说更不舍得买这么奢侈的玩具给我。成年之后，母亲才向我说出了这件事的真相。那时，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也许他们刚为某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过不愉快，或者也许是她已经厌倦为了别人而伪装自己，认为是时候去掉这些伪装了。总之，在事情发生 30 年后，母亲告诉我为了让父亲买那辆自行车，她跟他斗争了整整一个星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对我的溺爱也来源于她的自我否定。与父亲一样，她也感到自己像是一个力有未逮的游泳者。不过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想让我拥有她无法拥有的东西，实现她一生中不敢去尝试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祖母把父亲推入了一片陌生的世界，而母亲则是我进入美国未知世界背后的无声动力。

19 世纪中期，母亲的家族从俄国移民到一个名叫瓦斯卢伊的罗马尼亚小镇。他们家族原本姓布朗斯坦，为了加快在新世界的发展，英语化为布朗和斯通两个分支。外祖父萨姆有兄弟姐妹七人。1898 年，在外祖父 17 岁的时候，为了赶上一艘开往美国的船，他从瓦斯卢伊一路来到阿姆斯特丹。外祖父的父亲查姆是个葡萄酒商人，由于政府颁布了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法令，之后不久也步了儿子的后尘。这个家族的船费是由“德赫希男爵安置基金会”（Baron De Hirsch Settlement Fund）支付的，那是一家把犹太人重新安置到南新泽西作农民的基金会。

到达那里不久后，查姆离开农场，和妻儿一起来到纽约。

外祖父萨姆有五英尺八英寸高，他不仅是我们的家族中最高的人，而且是唯一长着硬硬的胡子、发亮的圆前额，并且嘴里总是紧紧叼着一枝雪茄的人。他起初在一家铜制品厂工作，后来来到了一家邮购商行做销售员。1900年左右，“斯通”支系中有人开了许多“5分10分”连锁店；1910年的时候，外祖父成了纽约分店的经理。他的父母和他们一起住在枫树街，在地窖里制造用于圣餐礼的葡萄酒，遵守着犹太人的戒律——他们是我们家族中最后两个这样做的人。

外祖母罗斯是这个家族的档案保管员，家族发展史上的这些事件都被记录在她打出来的一张纸上，并传给了我。她的记录还表明，外祖父在1918年成了“斯通”家族连锁店的采购员，并在九年后拥有了其中的一家店。外祖母的记录到此为止。不过不久前，我收到了未曾谋面的外祖父的一位侄女贝蒂·托马尔的来信，她现在仍然住在南新泽西。她的这封信填补了祖母记录中的一些空白——“1929年，生意失败了，家族也随之分裂。我想你的外祖父萨姆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去了俄国。”我以前只知道外祖父是个自由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但不知道他的这些事情。也许这是母亲嘤起的嘴唇后面隐藏的无数秘密之一，或许母亲实际上也不知道这些事情。

在同一封信中，贝蒂·托马尔还建议我——“我认为，如果你要写自传的话，纽约的犹太知识分子在第二大道致富，然后从富翁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嬉皮士，从嬉皮士转变为社会中的成熟一员，这应当是正常的，我们的后代也许都会重复这个故事。”她在信中接着写道——“我知道这种转变在你身上发生过。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不相信资本的人都有可能是蠢人。”贝蒂·托马尔肯定是布朗这一支的。

1907年，外祖父萨姆与当时只有17岁的罗斯·阿布拉莫维茨结婚。一年后，我的母亲出生了，取名布兰奇。母亲总是对自己的名字得意洋洋，部分是由于它的法国味道，部分是由于

它的矛盾修饰法：布兰奇·布朗^①。外祖母罗斯是祖辈里我最喜欢的一位。她是一个高颧骨的小个子妇人，时髦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慈祥的眼睛，好奇心让她显得很年轻（60岁时，她回到学校取得了高中文凭）。她总是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和建议：劝说我在咽下食物之前要一次不差地咀嚼23次；不要把刀子放到嘴里，甚至不要去舔刀子上的花生酱，因为我也许会像她一样伤到自己的舌头。说完，她就会伸出舌头给我看她伤在哪里，以此来警告我。

不过我最喜欢的是外祖母编的一首小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唱着这首小曲哄我入睡，并在我睡着前把我抱到床上：

外婆爱戴维
戴维爱外婆
外公爱戴维
戴维爱外公
爸爸爱戴维
.....

接着是包括母亲、妹妹、表兄弟姊妹、姨妈、舅舅、霍洛维茨家、布朗家、斯通家在内的全部家人，再接下去是朋友们，直到把我身边的人都数个遍。我喜欢外祖母唱歌哄我入睡的那些时光。这支小曲把我与身边的世界联系起来，不至于忘记这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人，以及与外祖母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其他人，包括父亲和母亲在内，都没有和我如此亲密过，或者做过如此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父亲在64岁时（比我写这些文字时的年龄老10岁），写过一封信给我，信我保存了下来，但从未再读过。当最近我再拿

① 布兰奇是白色的意思，布朗则是棕色。——译者